

让我煎熬了48年的数字

□ 张树田

2002年,母校百年校庆出版的《唐山一中百年史略》,首次正式公布了唐山一中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中蒙受损失的具体情况。其中提到地震当天,在学校过夜的教职工、家属、外来人员有105人遇难,远超幸存者的人数;加之812间校舍无一幸免,全部倒塌,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可见一斑。“105”这个数字,让我煎熬了48年。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当年这份生死簿的提供者正是我和时任路南南区南厂工房派出所的户籍民警小董同志。震后不久,市里要求各单位抓紧核查上报人员伤亡情况,唐山一中党支部责成我负责此项工作。作为一名新党员,我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下来,并马上同管境派出所户籍民警小董取得联系。记得她那时20岁左右,一脸稚气,朝气蓬勃。她知道我们学校地处极震区,伤亡惨重。而

我刚刚入职五年多,也知道学校百余名教职工分别居住在校内外,平日相互极少走动,况且当时正值暑假,人员流动极大,显然弄清伤亡情况并非易事。

于是,一连几天,我对照小董从废墟中挖出的户籍底册,首先筛选出在校园内居住的教职工的分布情况,然后分片逐户逐人进行排查。对于无人伤亡户和绝户者倒是不难统计,关键是暑假临时来校者情况异常复杂,需要反复查询。而不少家在外埠的老师假期中究竟身居何处,也颇费一番周折才能搞清。

遇难者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刘景旺、岳淑荣夫妇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三个已是大小伙子的儿子当天分别为三个离校的老师看家,全都命丧黄泉。岳老师曾是我在母校读书时的数学老师,那天我具体询问其中一个孩子的遇难情况时,只见她双眼垂泪,精神恍惚,泣不成声地说,三面墙倒了一面,正好把他砸在了床上。我

根本无法面对这位性情温和多才多艺的恩师,也讲不出适当的话语去宽慰她那早已破碎的心。

同样,对于指派我担负这个教职工生死情况调查的崔绍增副校长,我更是多年不敢提及内心的苦衷。崔校长不仅是我当年的物理老师,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刚回母校工作后,和崔绍增、谷瑞芝夫妇比邻而居。他们俊俏可人的女儿小丽,敦厚的双胞胎儿子大虎二虎,曾经给我们的小院带来无尽的欢乐。可是这三个花季年龄的孩子均殒命于地震,怎么不令人痛心疾首、肝肠寸断?我调离学校后,一直关注着这个可怜破碎的家庭。两位老人退休后一直未离职,依然默默无闻地继续工作,直至后来迁居老年公寓。我知道那些年每逢节日,两位老人都要在餐桌上摆好三个孩子的碗筷,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每年7.28大地震祭日,夫妇俩都会重复这令人无比心痛的一幕。谷瑞芝老师还会含

泪给远在天国的孩子们写下信件,让老伴亲手去寄发。

前些年,有朋友特意送给我一份唐山一中1971年5月12日印制的教职工名单,133个非常熟悉的名字,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随着岁月的流逝,其中大部分已经调离,自然减员和在地震中罹难,幸存者也均在耄耋之年。我调离学校时所居简易房的左右两邻于长善副校长和高建才、闫秀荣夫妇都曾经那么开朗奔放,终生奉献三尺讲台,无怨无悔。分别40余载,我从未问过当年他们面对丧妻失子之痛,是否也有过崔校长夫妇那般催人泪下的过往?我更不太知道,那105个亡者的亲人们,是怎样熬过了年复一年的人生至暗时刻。

苦难的崔校长夫妇如今已和三个孩子去天堂相聚了。今天的唐山一中教职工名录早已更新为全新的姓名,但是“105”这个极其普通的、令我煎熬了48年的数字,必将永载唐山一中的史册。

农家小院

□ 彭志英

老家,老爸爸妈妈有一处小院。红瓦白瓷的房子依山傍水,一条光滑平坦的水泥路直通院门。

甬道左侧的花圃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儿。个个形态各异,精神抖擞。有的花儿昂起了头,就像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他把风采毫不保留地呈现出来;有的低垂着头,就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有的含苞待放,三两片花瓣托举着紧抱的花蕾,就像一个蓄势待发的少年。花的颜色五彩缤纷,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黄的像金,争奇斗艳,婀娜多姿。蝴蝶和蜜蜂在花间翩翩起舞。

甬道右侧的菜园,已是郁郁葱葱。各种蔬菜比赛似的爬满茎干。那些顶花带刺的小黄瓜,在阳光照耀下翠绿欲滴,叫人垂涎三尺。豆角有四五厘米长了,在白花绿叶中半隐半现,就如《琵琶行》写的,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一排番茄秧长得粗壮有力,上面挂满了一只只的番茄。除此之外,还有油光发紫的茄子,挨挨挤挤的大葱,密密丛生的韭菜,层层叠叠的生菜……

大门右侧有一棵高大的杏树。每到初夏,黄澄澄的杏子颗颗饱满,缀满枝头。

母亲是个勤奋的人。她每天都早早起床打扫卫生,院子中间的甬道,被她冲洗得干干净净。

每到节假日,我们都要回老家陪伴老爸爸妈妈,欣赏欣赏乡村美景,品尝品尝农家饭菜。杏子熟透时,我会摘下一个咬一口,软软的,酸甜爽口。小时候,每到这个季节,我们这些孩子一放学就到这棵树下集合,美美地吃上几个杏子,然后再各回各家写作业。现在,伙伴们纷纷离家四处谋生,很难再聚在一起吃杏了。

“咯咯哒,咯咯哒”,母鸡报喜的声音传入耳中。我急忙来到院子西南角的禽舍旁,十几只母鸡抬起脑袋望着我,又低下头忙碌地啄食稻谷。鸡窝里,几只白白的鸡蛋映入眼帘。我小心翼翼地拾起来,热乎乎的,还带着母鸡的体温呢!

我满心欢喜,摘一些黄瓜、茄子、豆角,拔几棵大葱,掰一大把生菜,又割些韭菜,准备中午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农家饭菜供家人享用。

我喜爱乡村,更喜爱这个农家小院。它不仅为我提供了新鲜的蔬菜瓜果,还可以安放我浓浓的乡愁。

老黄牛

□ 张华英

我家曾有一头老黄牛,那是生产队解散时,队里按人口分到我家的。黄牛分到家,就要精心喂养,拉车种地全靠它呢。

清明时节,麦苗返青,要施肥浇水。老妈赶着牛车,时不时地和下地的同村人打着招呼;我们坐在车上,吹着春日徐徐的暖风,看着燕子在田间飞来飞去,听着车轮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响声,闹着笑着,心情格外愉悦。

路两侧的老杨树整齐地排列着,树干上泛着青绿色的亮光,成了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毛毛虫一样的杨树吊儿猝不及防地噼里啪啦地从枝头掉下来,砸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姐妹三个同时惊叫起来,老黄牛也慌得随即停下,冲天哐哐地叫了几声后,才继续向前走。

到了麦地里,施肥的施肥,浇水的浇水,老黄牛被拴在地头的小杨树上,静享自由了。

夏天来临,绿草青青,溪水潺潺,老黄牛迎来了好时光,它不用再吃往年囤的草料了,爷爷让我们去坑边放牛。

第一次放牛时,战战兢兢的我,生怕它那庞大的身躯碰我一下,大牛蹄子踩我一下。爷爷告诉我,对待它也要像对人一样,关心它,爱护它,它自然而然也就和你友好相处了。我听了爷爷的话,慢慢地靠近它,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它的脖子,和它说起了话:“老黄牛,我带你去吃嫩嫩的青草啊。”它似乎听懂了,没有抗拒我。

雨后的青草更加鲜嫩碧绿,老黄牛低头使劲地吃着草,我放下了所有的防备,用手轻轻地拍着老黄牛的脊背,抬头望望蓝蓝的天,看着脚下清澈的小溪水潺潺地向前流淌,情不自禁地哼起了《牧羊曲》。

秋天的老黄牛最累了,它要拉秋,它要压场,它还要种地。记得有一年中秋节,正是收秋的时候,我家的八亩玉米,老黄牛一车一车地不知拉了多少次,接下来还要把玉米秸拉回家,月亮升起来了,我们姐三个还在地里帮着妈妈装车。秋天的夜晚,天微微有些凉意,我们干了大半天的活计,肚子叽里咕咚地叫个不停,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一边走一边抱着玉米秸往车上装。老黄牛也累了,它慢腾腾地走着,饥饿的叫声也微弱了许多。到家的时候,妈妈招呼我们下车,那时我们已随着牛车有节奏的嘎吱声进入了梦乡。

自那以后,老黄牛的步子慢了,也瘦了好多,爷爷说它老了,不能再累着了。

后来,老黄牛被一个走街串巷的买卖人倒腾着吃肉的。听爷爷说,他们在老黄牛的胆囊里发现了牛黄,怪不得老黄牛清瘦呢,这牛黄可是纯中药,买牛人可赚大发了。

老家那已坍塌的牛棚总是让我想起那头老黄牛,它少言寡语,低调,不张扬,埋头劳作,任劳任怨,从不要求回报。我要向它学习。

大地震的前一天

□ 白桂云

1976年7月27日,是唐山丰南发生大地震的前一天。天然得无法形容,人们焦躁不安,好像馒头在锅里被蒸熟却又无法做任何挣扎似的。

那一年,我上初中二年级。当时学校留给学生的暑假作业是给生产队割草。我家住在县城胥各庄,那时候城市还没有现在这么大,出门不远就是田野。那个年代,人们割青草,或喂牲口或当柴烧。就在那天下午,我照例把草割回来,交给生产队的饲养员,饲养员给我写了“收到XX学生交来一筐青草”的收条。饲养员看我每天都积极地完成这项工作,态度很认真,主动问我:“写一筐少不少?”我胆子小,不敢弄虚作假,便说不少。学校给的割草任务是每天一筐,如果今天写了两筐,明天就不用去给生产队割草了。但我怕姥姥姥爷会责怪我,因为一个小女孩儿,一个下午根本就割不来两筐草。于是,我仔细把收条装在衣服口袋里,背上柳条筐回家了。

从小儿我们在姥家住。姥姥已经做好晚饭,高粱米粥过了凉开水,这样稀饭就变成了两种,一种是米汤,一种是水饭。都说米汤有营养,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吃用凉开水过滤的水饭。一锅刚刚蒸好的馒头,还冒着热气。看见了馒头,我就想起了天气,感觉自己也是在锅里被蒸的样子,汗立刻就发根渗

出,顺着发梢流了下来。

姥姥是一个持家的行家里手,她总是把带着很多壳子的高粱米择得干干净净,做出的饭吃起来格外顺口。我们吃饭用的是一张矮桌子,不足一平方米大。家里有姥姥、姥爷、妈妈还有我们姐妹三个,父亲当时还在外地工作。一家六口人围坐在这样一张小矮桌旁吃饭,显然有些拥挤,于是,姥姥便以还需要干些什么为由,不肯坐在桌边。这时候,妈妈总会用既心疼又嗔怪的口气责备姥姥说:“都吃饭了,你为什么还要干活?”姥姥显然对妈妈的这种嗔怪并不在意,依然带着慈爱的笑容,款款地说:“你们吃,你们先吃。”我那时候是不大在意大人们的这种感情表达的,理解不了姥姥为什么每次吃饭都不肯及时上桌,也理解不了妈妈为什么总用那种口气跟姥姥说话。

姥姥做的饭总是那么让人开胃,我记得当时蔬菜很少,姥姥就会用咸菜拌上蒜,加上几滴香油。有时候也用她自己制作的豆瓣儿酱,把切好的蒜拌起来。每次把这样的菜品送到嘴里的时候,我心里总觉得那是一种被宠爱的味道。

那一天,丰南电影院里正在放映电影《沸腾的群山》,还有另外一部我想不起名字的电影。通常都是7点半开演。虽然电影院离我们家不到500米,但是我们也得早去,这样才能挤到

自己的座位上,因为每一个座位不只坐一个人。

电影开演了,电影院里挤满了人。很多人赤膊亮背,有的拿着芭蕉扇子,有的拿着纸扇,不停地扇着。扇扇子的哗啦哗啦声,夹杂着你喊我叫声,都不影响人们看电影,似乎什么声音也遮盖不住银幕上发出来的音响。人们看电影的注意力太集中了,就像鲁迅先生写的一样,不管什么热闹,都伸着脖子往前看。不过也有例外,我旁边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早已在她妈妈的怀里满头大汗地进入了梦乡。

电影将近11点钟才散场,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出电影院的大门,有的被踩掉了鞋,拉在了同伴的后面,于是潮水里又多了一阵阵喊叫声。我们也是在那一股潮水的簇拥下,流出了电影院的门口,一溜烟地回到了家中。

我们推开用竹竿儿扎成的柴门,院子里一片寂静。白天放在院子里的鸡窝已经不见了,说明姥爷已把那几只下蛋的老母鸡哄进窝里,像往常一样拎进了堂屋。我想大人们都已经睡下了。我们悄悄地走进了院子,本想就这样睡去,却发现姥姥正站在北屋的门口,她一直微笑着迎着我们。见我们回来了,她立刻拿过来洗澡的大盆,妈妈则从水缸里舀出来已经晒了一天的温水,给我们每个人都洗了澡。姥姥一直看着,最后

井拔凉

□ 艾立起

井拔凉,是老家的土叫法,指夏天从水井深处打上来的井水,它是我童年最美味冷饮。

在村子里街道的最高处,村民们挖坑寻源,砖砌石垒,一口水井,就成了庄稼人的命脉。清晨,人们用一根扁担挑着两个水桶,排队等在井沿边。村民用扁担钩子钩住一个水桶,探进井里,左右晃几下,一使劲,水桶扎进水里,两手轮换往上提,到井沿,双手猛一甩,一桶井拔凉就稳稳地放在井沿上;再挂一桶提上来,颤悠

悠担回家。

劳作一天的父老乡亲,回到家里最大的享受就是痛痛快快地喝上几口井拔凉,以消除身上的暑气和疲惫。吃午饭、晚饭时,高粱米粥淋出米汤,用井拔凉水一泡,再吃上几口大豆酱、腌咸菜,心里别提多美啦!井拔凉还用于接待贵宾。那年,二姨家的表兄来在三伏天来看望我父母,见到大汗淋漓的外甥,母亲吩咐我:“赶紧给你表兄打井拔凉去。”于是,井拔凉水,加入几滴醋精、几粒糖精,一份最美冷饮便大功告成。看到表兄咕嘟咕嘟喝井拔凉的样子,我馋得直咽唾沫。

我小时候饮用的井拔凉,源自全村300口人共用的一口“笨井”。这种井一般深六七米,井壁用长条石垒成六边形,井口是大约一米见方的正方形,四周用条形石砌成井台。其优点是易开挖,成本低。但弊端很多:一是不卫生。井口没有遮掩物,刮风进脏土,下雨灌脏水,

几乎年年夏季都发生井被雨水灌满的现象。平时一些不懂事的小孩往里面乱扔东西更是家常便饭。二是不安全。水井就是天然的陷阱,不懂事的小孩不留神会跌落到井里,冬季井台结冰,担水的人也可能失足落井。三是不靠谱。天旱水位低,井水就枯竭;逢年过节用水量,往往供不应求。我们邻村的井就是一到过年就发生“供给侧”断线,他们村的人都到我们村担水。那时,等候担水的人们,水桶水扁担排成一百米的长队,是老家过年的独特景观。因此,越是到干旱的夏季,井拔凉越显得弥足珍贵。

为了保证全村人饮水的及时、安全、卫生,村里专门指派两名高望重而且敢说敢管的“贫下中农”代表,负责水井的警戒与管理。他们的职责首先是保护井水卫生,防止脏东西掉入井里,造成污染;其次是阻止满街乱跑的小孩靠近井

口,以防失足落井。一次,家里来客,我奉命去打井拔凉。看井的爷爷见我人小体弱,难当此任,便主动接过我手中的水桶,给我打了小半桶(因我力气小,提不动一桶水)。当时,大多数孩子是用玻璃罐头瓶打水。

1980年夏,我从部队回家探亲,进了家门,母亲见到满头大汗的我,急忙下炕取暖水瓶倒水。我发现家里有一桶冒着冷气的井拔凉,便说:“妈,到家了,我就按老家的规矩来。”于是,我站在水桶旁边,灌足了满满两大缸子井拔凉,顿时觉得全身都凉透了,舒服透了。也怪,在大同营房,即便是伏天,中午睡觉我也要用棉被盖住肚子,否则,就会着凉,犯肠胃疾病;而在老家,开怀畅饮井拔凉却啥事没有。听人说,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每到夏季,我就想起儿时那甘甜清冽的井拔凉。